

毛泽东思想 当代价值论集

汪裕尧 著

中央文献出版社

毛泽东思想 当代价值论集

汪裕尧 著

中央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毛泽东思想当代价值论集/汪裕尧著.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1

ISBN 978-7-5073-3748-8

I .①毛… II .①汪… III .①毛泽东思想—文集
IV .①A8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22632号

毛泽东思想当代价值论集

著 者/汪裕尧

责任编辑/杨茂荣 王玉强

封面设计/彭 勇

责任印制/寇 炫

出版发行/中央文献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四北大街前毛家湾1号

邮 编/100017

网 址/www.zywxpress.com

销售热线/010-66513569、63097018、66183303

经 销/新华书店

排版印刷/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787×1092mm 16开 16印张 175千字

2013年2月第1版 2013年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73-3748-8 定价：30.00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写在前面

这本小册子，不是全面系统论述毛泽东思想当代价值的专著，而是从不同角度述说毛泽东思想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一些文章的汇集。这些文章，写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之后，大多在中央一级出版社出版的书刊上发表过。它们数量不多，只有区区十几篇，但关联着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大事。首篇是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写的一条注释，主要是介绍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产生的历史背景和整理发表的过程。《论邓小平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问题上的新贡献》一篇，对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有关观点作了比较研究，文中对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重要论断的评述，被人民网选作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十大理论名句的专家点评之一。《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伟大历史贡献》一篇，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全过程，对毛泽东对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作了历史的分析。书中有多篇文章论及中国共产党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及其理论建设、反腐倡廉建设等重大课题。末篇《从毛泽东看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为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写的，意在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角度，概括毛泽东倡导和践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此外，在纪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成立30周年时写的

写在前面

《回眸我的文献生涯》，我把它作为附录收入这本小册子，借以提供一些背景材料。

明年是世纪伟人毛泽东诞生120周年。作为长期从事毛泽东著作编辑和毛泽东思想研究的一名理论工作者，此时将过去写的研究毛泽东思想的一些文章汇集起来，出个小册子，一是为了表达对他老人家的深切怀念，二是为了便于联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进行思考，进一步认识它的由来和发展，三是想借此同关心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同志和朋友进行切磋，交流看法。由于个人水平不高，文中所说看法肯定有不当之处。为如实反映作者当时的认知，收入本书时未作任何改动，欢迎批评指正。

汪裕尧

2012年8月

目 录

关于《论十大关系》的产生、整理和发表.....	1
毛泽东和建国初期的反腐蚀斗争.....	5
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纲领性文献.....	16
诞生在革命战争年代的《毛泽东选集》.....	32
换一个视角：毛泽东怎样看待他自己.....	45
论邓小平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问题上的新贡献.....	70
像毛泽东那样重视理论建设.....	94
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几个问题.....	103
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党风廉政建设.....	115
从《寻乌调查》、《反对本本主义》看毛泽东调查 研究的理论和方法.....	139
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伟大历史贡献.....	151
建设“伟大的工程”永远保持党的先锋队性质.....	170
毛泽东的发展观和新中国的发展.....	185
毛泽东和党的建设伟大工程.....	205
从毛泽东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228
附录 回眸我的文献生涯.....	239

关于《论十大关系》的产生、 整理和发表

1955年下半年到1956年初，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出现了高潮。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从1953年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算起，已经有了3年多的实践经验。对于苏联经济建设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我们也逐步有所了解。以苏联为鉴戒，总结我们自己的经验，探索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任务，已经提到我们党的面前。毛泽东同志关于十大关系的思想，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从1956年1、2月起，毛泽东同志和刘少奇同志分别听取了中央许多经济部门的汇报。毛泽东同志主持的汇报会用了一个半月时间，有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的一些领导同志参加。这是建国以后党中央领导同志对经济建设问题进行的一次时间比较长、内容比较系统的调查研究。十大关系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经过中央政治局几次讨论，由毛泽东同志集中概括出来的。毛泽东同志先在4月25日举行的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十大关

系的报告，接着又在5月2日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对于十大关系的思想形成的过程，毛泽东同志在1958年2月18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曾经说过：那个十大关系怎么出来的呢？我在北京经过一个半月，每天谈一个部，找了34个部的同志谈话，逐步形成了那个十条。如果没有那些人谈话，那个十大关系怎么会形成呢？不可能形成。

毛泽东同志关于十大关系的报告，当时在党内高中级干部中进行过传达。同年九月召开的党的八大，把十大关系作为指导方针，多方面地体现在大会的政治报告和其他文件中。在11月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周恩来同志对十大关系中提出的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关系，也就是毛泽东同志多次谈到的“又要重工业又要人民”的思想，结合我国实际情况，作了深刻的阐述。其他一些中央领导同志也分别结合各个方面的建设事业，就这个讲话的原则精神作过论述和发挥。这些，都在实际工作中起了重要作用。但是，从1958年开始，这一方针的贯彻执行受到了“左”的指导思想的严重干扰。在60年代国民经济的调整过程中，十大关系的许多重要的思想原则，又重新提出和实行，并且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为了进一步教育全党，在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执行的时候，刘少奇同志于1965年底写信向毛泽东同志建议，将这个讲话作为内部文件印发给县、团以上各级党委学习。毛泽东同志看了这个讲话的整理稿后批复：“此件看了，不大满意，发下去征求意见，以为将来修改之助。此意请写入中央批语中。”同年12月27日，中央写了一个通知，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印发县、团级以上党委。

当时印发的《论十大关系》，是以毛泽东同志1956年5月

2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为基础，吸收4月25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的部分内容整理而成的。在这个整理稿中，原讲话记录稿中有些重要的内容，如对苏联和东欧国家在处理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关系、民族关系以及对斯大林的态度等问题上的错误的批评；对我国国内工作中过高地估计战争危险，不重视发展沿海工业，以及在行政措施上照搬苏联的作法等缺点的批评，没有整理进去。

1975年，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和《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编辑工作期间，关于《论十大关系》一文，曾在向毛泽东同志的报告中提出，将两次讲话记录稿进行综合整理。后来在胡乔木同志具体主持下完成了整理工作。这个整理稿忠实地体现了讲话的主要精神（以苏联为鉴戒，总结我国已有的经验）和语言风格，恢复了以前整理稿中没有整理进去的重要内容，并作了必要的文字加工。整理稿于7月10日送邓小平同志，13日转送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在给毛泽东同志的信中说：“《论十大关系》稿，已整理好，我看整理得比较成功”，“我们在读改时，一致觉得这篇东西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以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对国际（特别第三世界）的作用也大，所以，我们有这样的想法：希望早日定稿，定稿后即予公开发表，并作为全国学理论的重要文献。”当天，毛泽东同志即审阅了这个稿子，并批示：“同意。可以印发政治局同志阅。暂时不要公开，可以印发全党讨论，不登报，将来出选集再公开。”

1976年12月26日公开发表、随后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论十大关系》一文，就是经过毛泽东同志亲自审定的这个整理稿。

毛泽东同志提出十大关系的指导思想，正如他在后来的讲话中多次说到的，是要寻找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1958年3月10日，他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中说：1956年4月提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1960年6月18日，他在《十年总结》中进一步明确指出：“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开始反映中国客观经济规律”。后来，在1962年1月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同志又提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原则。

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的许多重要的思想和原则，由于在“大跃进”之后以至十年动乱期间受“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干扰破坏，在长时期内未能得到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些重要的指导思想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进一步的运用和发展。

（载于《文献和研究》1982年第8期，
选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
问题的决议注释本》 汪裕尧执笔）

毛泽东和建国初期的 反腐蚀斗争

1951年底在党和国家机关内部展开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简称“三反”）的斗争，是建国初期反对资产阶级腐蚀的一场严重斗争。这场斗争，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领导下，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它有力地抵制了资产阶级对革命队伍的腐蚀，清除了一批腐化分子，教育挽救了一批干部。影响所及，使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受到了一次前所未有的荡涤，整个社会风气曾为之一新。

《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3期刊载的《毛泽东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腐蚀的十份文电》，基本上反映了这场斗争的历史面貌，阐明了斗争的重大意义，概括了我们党指导这一斗争的方针政策和主要经验。它们虽然都是30多年以前写的，今天读起来仍然感到十分亲切，给人以深刻的启迪。

(一)

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发生在我们党执

掌全国政权两年之后，并不是偶然的。它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是我国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时期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

由于我国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同我们党有长期合作的历史，也由于我国经济落后，私人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有利于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因而在全国胜利后的一个时期内，国家对私人资本主义采取的政策是：一方面尽可能发挥他们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另方面又从活动范围、税收政策、市场价格、劳动条件等方面限制其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因素。但是，资产阶级作为剥削阶级，特别是他们中间的不法分子，唯利是图，对国家的限制必然要采取各种方式进行不同程度的反抗。这种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就成为这一时期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与此相联系，资产阶级中的不法分子，为了获取尽可能多的利润，往往采用请客、送礼、行贿、入股，直至施用美人计等方式，向手中握有权力的国家工作人员进攻，把他们拉过去为自己服务，因而必然要发生腐蚀和反腐蚀的斗争。建国初期进行的这场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实质上就是一场反对资产阶级腐蚀的斗争。

对于全国胜利以后资产阶级会用糖衣裹着的炮弹向我们袭击这一点，党中央是预料到的。早在1949年3月举行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提醒全党警惕资产阶级腐蚀的危险。他说：“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

会出来捧场。”“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出现，他提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革命胜利以后，大多数干部经受住了胜利的考验，继续保持了谦虚、谨慎和艰苦奋斗的作风。但是，我们队伍中的一些不坚定分子，进城以后，在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的侵袭和引诱下，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的感染下，渐渐地忘乎所以，陷进了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泥坑。同时，随着革命事业的迅速发展，我们的干部队伍迅速扩大，他们中间有些人在旧社会沾染的恶习和影响，还没有来得及改造。这是国家工作人员中发生贪污浪费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加之建国之初，百废待举，革命和建设的任务都很繁重，有些必要的制度还没有来得及建立或者还很不健全，这也给了贪污受贿等犯罪活动以可乘之隙。

同国家工作人员中贪污受贿等错误行为作斗争，并不是从“三反”斗争开始的。建国以后，我们对这方面的问题即时有发现，并作了必要的处理。但在前两年只是零打碎敲地解决问题，发现一个处理一个，因而没有能起到应有的威慑和教育作用。

(二)

1951年9月，东北地区在增产节约运动中揭露出干部中的严重贪污问题，引起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严重注意。同年

十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即作出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和“三反”斗争的决策。此后，毛泽东于11月下旬以中央名义先后批转了东北、西南、华北三个中央局关于开展三反斗争情况的报告，要求各地“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12月1日，中央正式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毛泽东在审阅这一决定时作了重要的修改和补充。这个决定下达后，即开始了“三反”斗争的全面发动。

为了推动“三反”斗争的展开，在决定下达的一个月时间内，就以中央名义下达了四个指示，批转了37个报告。这些文电，强调要放手发动群众，大张旗鼓地进行“三反”特别是反贪污的斗争。12月31日，中央委托薄一波、安子文等同志出席中央直属机关总党委召开的有500多人参加的党委扩大会议，当场宣布中央决定，限期于1952年1月上旬所属一切单位务须发动群众实行坦白检举，否则一律撤职查办。在这次会议上点名表扬了做得好的单位，也批评了做得差的单位，并撤职查办了几名高级干部。这次会议在中央机关引起强烈的反响，许多单位当日回去连夜开会部署。第二天，在1952年元旦的团拜会上，毛泽东又号召“我国全体人民和一切工作人员一致起来，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将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洗干净！”这一天，很多部长、副部长都没有休息，团拜会一结束就回机关，戏也没有看。到1月3日，差不多所有单位都开了坦白检举的群众大会。1月

4日，中央发出《关于立即抓紧“三反”斗争的指示》，向各地通报了中央机关发动“三反”斗争的情况，要求各地限期发动群众开展斗争。此后，“三反”斗争进入高潮，在地方专区以上、部队团级以上机关都普遍开展了起来。

“三反”斗争揭发出来的大量材料表明，党和国家机关内大的贪污案件往往是同资产阶级的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违法活动相联系的，大都是国家工作人员中的贪污分子同社会上资产阶级中的不法分子勾结起来干的。为了把“三反”斗争进行到底，彻底打退资产阶级的进攻，需要内外夹攻，在工商界中同时进行反对各种违法活动的斗争。因此，中央于1952年1月26日发出了《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中央要求在全国一切城市，首先是大中城市，团结工人阶级、守法的资产阶级及其他市民，向着违法资产阶级开展“五反”斗争，以配合党政军民内部的“三反”斗争。从2月上旬开始，在全国各大城市（包括省城）广阔的“五反”斗争的有力配合下，“三反”斗争进一步迅速地向广度和深度发展。

这次“三反”斗争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即发动群众阶段、“打虎”阶段、定案处理阶段和建设阶段。为了指导这场斗争，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都建立了节约检查委员会，作为党委领导“三反”斗争的办事机构。从2月上旬开始，不少单位结束了第一阶段，即发动群众阶段，先后进入揭发、批判和斗争贪污分子的“打虎”阶段。在第二阶段，从北京开始，各大行政区都先后举行了审判大贪污犯的公审大会，给了贪污分子有力的打击，同时使人们受到很大的鼓舞，正

气大伸，邪气大降。随着斗争的深入，犯有贪污、浪费等错误的人员的定案处理问题提上了日程。为此，中央于3月6日发出了关于处理贪污、浪费问题的若干规定。3月8日，政务会议批准了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错误的若干规定，同时还批准了北京市人民政府在“五反”运动中关于工商户分类处理的标准和办法。4月1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又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于是“三反”斗争陆续转入第三阶段，即核实定案处理阶段。当时由于春耕大忙季节已经到来，为了不误农时，中央决定县区乡三级机关的“三反”斗争推迟到秋后结合农村整党进行。从全国范围看，已经开展“三反”斗争的单位，到五月底为止，处理阶段已经或者即将结束，有的已经开始或即将开始进入建设阶段。同年10月25日，中央批准了安子文关于结束“三反”问题的报告，历时十一个月的“三反”斗争正式宣告结束。城市的“五反”斗争，也大体在这个时候宣告基本结束。

(三)

毛泽东在领导“三反”斗争的过程中，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坚强决心和巨大魄力，表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深刻洞察力和领导艺术。他在斗争中提出的重要思想和总结的主要经验，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1) 要把反对资产阶级腐蚀作为执政党建设的一件大事来抓。前面说到，早在建国前夕，毛泽东即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这个问题，唤起全党的注意。在东北地区揭露出干部大批贪污的问题以后，他敏锐地看到了资产阶级腐蚀对于

革命队伍的巨大危险性，决定随即发动一场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他强调指出，反贪污反浪费“实是全党一件大事”，“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才能克服二中全会所早已料到的这种情况，并实现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毛泽东在问题刚刚暴露的时候就尖锐地向全党提出，并把反对资产阶级腐蚀的斗争同党的建设紧密联系起来，作为全党的一件大事来抓，这是很有远见的。根据毛泽东的意见，1952年2月3日，中央发出了《关于“三反”运动应和整党运动相结合》的指示，进一步指出，“三反”斗争是一个更加深刻更加现实的整党运动，不发动群众开展“三反”斗争，党内存在的许多严重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就不能被彻底揭露并得到应有的惩处，广大的党员、干部就不能从中受到应有的教育，资产阶级思想对党的侵蚀就不能得到认真的清理和有效的克服。因此，中央要求各级党的组织在“三反”基础上，按照党员标准，对党员进行登记、审查和处理，并对干部作一次认真的考察和了解，坚决清除贪污蜕化分子，撤换那些官僚主义分子和居功自傲、不求上进、消极疲沓、很不称职的人的领导职务，大胆提拔一批德才兼备的优秀分子到各级领导岗位，使“三反”斗争同党的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实践证明，把反对资产阶级腐蚀作为党的建设的一件大事来抓，是完全必要的和正确的。它对50年代成为建国以后我们党风和社会风气最好的时期，有着重要的作用。

(2) 反腐蚀斗争要从高级领导机关和高级领导干部抓